

忆恩师

yi en shi



25 位先辈的弟子撰写的传记文稿。这些弟子都早已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他们长期师从先辈，以自己亲历与感受最真切地记述先辈。

吴汝焯 王步峥 许增华 ○ 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ZHONGGUONONGYEDAXUE CHUBANSHE

忆 恩 师

吴汝焯 王步峥 许增华 主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忆恩师/吴汝焯等主编.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655-0037-4

I. ①忆… II. ①吴… III. 中国农业大学-优秀教师-生平事迹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3528 号

书 名 忆恩师

作 者 吴汝焯 王步峥 许增华 主编

策划编辑 汪春林 高 欣

责任编辑 童 云 才 杰

封面设计 郑 川

出版发行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电 话 发行部 010-62731190,2620

读者服务部 010-62732336

编辑部 010-62732617,2618

出 版 部 010-62733440

网 址 <http://www.cau.edu.cn/caup>

e-mail cbsszs @ cau.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1 092 16 开本 21.5 印张 276 千字

印 数 1~3 000

定 价 66.00 元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题 词

中國農業高等教育
與農業科學的先驅

何康



弘揚大師風華傳承辦學
理念培育創新人才

相重揚

二〇一〇年春

中国现代生物科学奠基人

施平题

感 言

原北京农业大学三位老领导吴汝焯同志、刘仪教授、王步峥同志倡议编写《忆恩师》文集，记录了北京农业大学早期 25 位知名教授的传记，读后深受感动。他们的出身、求学、任教、成果、报国……无一不激励着后辈们前进。“名师荟萃、人才辈出、成果辉煌、代代相传”。北京农业大学其历史可追溯到 1905 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是我国现代农业高等教育的发祥地，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 9 月中央决定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北大学三所大学的农学院合并，建立北京农业大学，校址设在北京罗道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马叙伦部长签发“高三字第二六六号文”确定校名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 年 9 月 3 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孙晓村为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954 年国务院决定将北京农业大学列为全国六所重点大学之一，并于 1956 年与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共同评定十位一级教授，即戴芳澜、熊大仕、俞大绂、黄瑞纶、陆近仁、周明翥、李连捷、沈其益、林传光、姜成后。他们是学校的栋梁、学科的奠基人，同时评定十一位二级教授。“文革”期间学校迁到延安办学，1979 年国务院决定北京农业大学迁回北京原地办学，结束了“文革”期间长达 10 年的流浪生涯，使北京农业大学得以恢复、重建，并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作出新贡献！同年，俞大绂教授（1980 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敬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元帅题字北京农业大学校名，雕刻在汉白玉石碑上，至今仍在校园中心的图书馆前，激励全校师生员工前进！

2005 年纪念中国农业大学建校 100 周年的盛大庆典,回顾了从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到中国农业大学建校 100 年中“名师荟萃、人才辈出”的辉煌历程。据统计,学校共培养出中国科学院院士 46 人(其中首批院士 25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8 人,两院院士共计 64 人。在他们的培养、教育、推动下,农大成为我国农业科技人才的摇篮,声誉海内外。

科学奠定了国家的兴旺,国家又造就了一流大学和人才。

2009 年 5 月 2 日胡锦涛总书记、国家主席视察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的讲话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这将激励着中国农业大学广大师生员工不断为新的更高的目标奋斗。

毛达如教授

2009 年 11 月 5 日

注:毛达如教授系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编写说明

我们编写《忆恩师》这本先辈的传记性文集，主要是缘于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前夕原北京农业大学早期校友的一项建议，是他们为了缅怀自己的母校和先辈，情感纯朴、真挚地向我们提出的意见。希望学校能编一本书，把先辈们一生为了国家的教育事业所做的事迹记录下来，让大家总能记着他们、学习他们和传承他们。几乎是同时也有几位先辈曾表示乐于看到学校为他们撰写传记，身在国外的李景均先辈的一次来信中就表示了对学校为他撰写传记的期望，来信写得十分真诚。面对校友们的要求和先辈们的期望，真情所致，使我们深感难辞其责，只好尽力承担起这项工作。

我们理解为先辈撰写传记是一项深有意义的工作，但考虑到它又是一项史料的抢救性工作，时不宜迟。之后经多方商议，根据可能的条件我们确定了 25 位先辈，并请他们的弟子为其撰写传记文稿。这里所指弟子都早已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他们长期师从先辈，可以自己亲历与感受最真切地记述先辈。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年逾古稀，甚至超过了八旬，还邀请他们为先辈写传，真是勉为其难。因此我们未设完稿时限，对文体、篇幅以及内容本身都未提任何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

为先辈撰写传记得到了所有写作者的热情支持。在 25 篇文稿中，李连捷、黄瑞纶两位先辈的传记都是作者对过去的多篇文稿认真研究后选送给我们的。其余 23 篇都是写作者为本文集特地撰写的，并且出于他们高度的责任感对传记的史料征集和文稿的撰写工作都极为认真，应该说每一篇传记文稿都是作者的精心之作。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

历时六年，本文集终于可以付印出书。它记述了先辈们一生

为国家在培养人才、发展学科以及促进生产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也记述了他们为办好这所国家的重点大学所建立的影响深远的历史功绩，并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

文集还一再记述了先辈们高尚的精神境界，体现在他们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崇高信念，他们作为教师的道德风范和科学的教育理念，他们不断刻苦和严肃的治学精神以及他们厚重的学术造诣和勤奋的工作，这一切更是令人崇敬。

非常感谢农业部老领导何康部长、相重扬副部长长期以来对学校的关心，并为本书题词。

衷心感谢原北京农业大学老领导施平书记、代理校长九十九岁高龄之际还惦念着多年工作过的这所学校，并为本书题词。

我们特别要感谢中国农业大学瞿振元书记、柯炳生校长、张东军副书记对于我们征集、抢救学校早期 25 位我国知名科学家的珍贵史料并编辑本文集所给予的关心和热情支持。

还要感谢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校友工作办公室、档案与校史馆对于我们工作给予的难以计数的帮助和学校出版社领导及全体同仁的大力支持，以及在六年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种种关怀、支持的老教师们和各有关单位的同仁。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在编辑本文集中存在的诸多缺点、错误，恳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本文集对于先辈的名次排列我们是按原北京农业大学早期各系系号及参照先辈任职情况编排的。

编 者

2010 年 6 月

目 录 Contents

戴芳澜教授	黄 河	宋大康 / 1
俞大绂教授	李季伦	李青山 / 17
汤佩松教授	匡廷云	王步峥 / 29
李景均教授	杨作民	张树榛 / 49
蔡旭教授	张树榛	杨作民 / 63
李竞雄教授		戴景瑞 / 75
沈隽教授		吴德玲 / 91
沈其益教授	李庆基	王步峥 / 107
林传光教授		黄 河 / 129
裘维蕃教授		雷新云 / 145
周明牂教授		杨奇华 / 169
陆近仁教授	虞佩玉	常玉珍 / 179
李连捷教授	石元春	林 培 / 185
彭克明教授	毛达如	陈伦寿
叶和才教授		曹一平 / 201
孙渠教授		陶益寿 / 215
黄瑞纶教授		韩纯儒 / 223
娄成后教授	李酉开	钱传范 / 233
胡秉方教授	袁 明	王学臣
吴仲贤教授		武维华 / 245
		李增民 / 251
		张 劳 / 257

汤逸人教授

熊大仕教授

张鹤宇教授

应廉耕教授

王毓瑚教授

潘君乾 / 271

孔繁瑶 / 287

刘济五 / 295

张仲威 / 305

董恺忱 / 311

戴芳澜教授

(1893—1973)



戴芳澜，字观亭，湖北江陵人。1893年5月4日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书礼世家。父亲戴经和母亲邓氏过着简朴的生活。1900年丧母。1907年在伯父的资助下进入上海震旦中学，1910年毕业。在震旦中学打下了扎实的法语根底。1911年考取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14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专攻植物病理学，1918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学位。一年后，由于家境困难辍学回国，任教于南京江苏省立第一农业专科学校。1920年改在天津一家私人农场管理园艺。1921年与邓淑媛结婚。同年应聘于广东省农业专门学校讲授植物学和植物病理学，同时从事植物病害调研。1923年应聘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任农科病虫害教授。在校授课之余，从事植物病害与植物病原真菌的研究。1927年应聘为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兼植物病理学组主任。在金陵大学期间从事了大量的研究与培养学生工作。1934

年,清华大学成立农业研究所并聘戴芳澜为教授兼植物病害组主任。由于之前他已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补助金,乃在清华报到后携夫人为助手到美国纽约植物园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做研究。但在美国期间仍以通信方式安排清华农业研究所植物病害组的各项筹建工作。一年后才到清华上任,带领开展多项植物病害与真菌分类研究。但是工作刚刚步上轨道,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便全面爆发,清华大学先迁湖南长沙,后转迁昆明大普集镇。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尽力设法增加了人员,开展了以西南地区真菌与植物病害为主的多方面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清华大学由昆明迁回北平,清华农业研究所扩大为农学院。戴芳澜出任植物病理系主任,带回各人在昆明的全部研究资料,以致从1945—1948年间,戴芳澜本人以及他所带领的同仁们所发表的近20篇论文都是由昆明到北平延续研究工作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院校合并,1949年成立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教授和校务委员。1953年他应中国科学院之邀承担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的筹建工作,并于当年该研究室正式成立时起兼任室主任。1956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将该研究室扩建为应用真菌学研究所,由戴芳澜任所长。1956年评为一级教授。1958年应用真菌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戴芳澜任该所的首任所长。为了集中精力专注于推进新成立的微生物所的全面发展,从1959年起戴芳澜不再兼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而专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一直到1973年1月3日去世。

戴芳澜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深为科学界所敬重。1929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1936年当选为中国植物学会第四届会长。1948年4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年他被选为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的新一届理事长。1955年,戴芳澜被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同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

科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的荣誉称号。1962年他被选为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名誉理事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曾受到周恩来和朱德的亲切接见。

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和中国植物病理 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戴芳澜自幼勤奋好学,早期家境并不富裕,连小学都几经中断。中学还是靠伯父的赞助才得以完成。毕业后年仅17岁的他又完全依靠自己努力考取留美预备班,才得以出国留学。但正在进入研究生院攻读学位时,又因父亲失业而中途辍学回国,丧失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回国后虽谋得教书职位,然因时局动荡,旧社会的派系之争,几度遭解聘更换学校,并有一年不得不在天津为一私人农场管理园艺,命运坎坷。即便如此,戴芳澜以贫贱不能移的坚韧毅力,奋发图强,矢志投身于中国的植物病理和真菌学事业。如他1920年撰写的《植物病害之现行治法》,1923年发表的《芋疫病》都是他在广州课外进行调研的结果。后者是中国人对疫霉属的第一篇研究报告。在南京东南大学教学之余,他还经常到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查阅资料,孜孜不倦地研究植物病害和病原真菌。他还研究过江苏、浙江的水稻病害及防治。1927年发表了《江苏麦类病害》和《中国植物病害问题》等论文,这些都是他在抓紧时间和一切可利用的条件下完成的。直至1927年受聘于金陵大学才得到比较稳定的教书和研究条件,施展其才华,教书育人做研究。按照戴芳澜自己的话:“在金陵大学这几年中生活较安定,我的研究工作和培养学生主要就是在金大这一段时期内做的。”在为今后造就一大批植物病理界栋梁之材的同时,他自己在7年中陆续发表了《江苏真菌名录》等20篇论文。但这是他凭自己的民族气节,在针对某些外国人的欺侮,努力进行抗争,据理取得了应有

工作条件的情况下才得以获得的结果。他曾写道：“在金大时期，由于校内外国人欺侮中国人，我常与他们冲突。”他所以能够得到必要的研究条件其中有一争取过程。即金大是一教会学校，许多教授、系主任都是外籍人士，其中少数不免带有高人一等的思想。金大农林科生物系主任斯图尔德(A. Steward)与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萨克斯特(R. Thaxter)教授达成采集中国西南地区真菌标本的协议。戴芳澜受托承担这一任务时，力争标本应由中美双方同等分享。斯图尔德看不起中国人，遂以必须要有人能够对标本进行研究作为条件威胁说：“你们分了标本谁来鉴定？”戴芳澜以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精神理直气壮地回答说：“由我。”并且很快选定了有较多真菌寄生的高等植物标本开始进行工作。在他的坚持和所显示的研究才能事实面前，斯图尔德无奈，只得同意了平分的原则。戴芳澜因此更是下定决心要为中国人争口气做出成绩。由此便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真菌分类的研究上。先从白粉菌做起，越做越广越精益求精，果然做出了国际水平的成绩。1930年发表了首次由中国人报道的寄生于植物上的真菌新种的论文《三角枫上白粉菌之一新种》，成为中国真菌学创立的标志。

戴芳澜在1931年发表的《竹鞘寄生菌之研究》一文中，报道了他对竹多腔菌子囊双壁结构的形成方式和过程所进行的详细观察。这反映出他以后在真菌分类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不仅要注意形态，还要注意细胞学、发育过程以及遗传学等所有生物学性状。此文一经发表，立即为国际真菌学界所公认并被写进好几种真菌学教科书中，该论文也被列为重要参考文献。直到1994年出版的国际公认的权威性教科书《真菌概论》(Introductory Mycology)的第四版中还引用了戴芳澜的这项工作，并刊登出戴芳澜所绘的竹鞘多腔菌原图的重绘图。经过60多年以后仍旧受到如此重视，可见戴芳澜发现的重要和其工作是经得起考验的。1934—1935年他在纽约植物园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老同学道奇(O. B. Dodge)合作研究脉孢菌的遗传。结果写成

《脉孢霉的两个新种》和《脉孢霉的性反应连锁》两文,于1935年和1936年分别发表在美国的《真菌学报》(Mycologia),获得了普遍的好评。除在当时受到重视外,还成为真菌细胞遗传学的经典文献。在金(R. C. King)主编的《遗传学手册》第一卷《细菌、噬菌体、真菌》(1974)(Handbook of Genetics: I: bacteria, phage and mycology)中被引用。

戴芳澜不仅在研究的深度上有突出贡献,在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研究上更有着宽阔的研究广度。在美期间他利用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图书和标本条件查看和收集了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真菌资料和中国真菌标本,为编写《中国真菌名录》做了准备。由金大到清华在北平期间先后发表了9篇《中国真菌杂录》和1篇长达478页的《中国真菌名录》,分别描述了锈菌、白粉菌、霜霉菌、尾孢菌等,还报道了炭角菌科的一个新属 *Xylariopsis*。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内迁昆明,当地丰富的真菌资源为他进行研究提供了好机会。戴芳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调查,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随后几年发表了《云南的鸟巢菌》、《云南地舌菌的研究》、《中国西部锈菌的研究》、《中国的尾孢》等重要研究论文。戴芳澜先后报道了69种尾孢菌,其中包括14个新种和许多在中国未曾报道过的新纪录。他对云南丰富的地舌菌种类尤其感到高兴。在其论文中这样写道:“云南是假地舌菌属(*Hemiglossum*)模式标本的产地,地舌菌的种类异常丰富。”他所详细描述云南地舌菌29种,4个变种,其中就有12个新种和3个新变种。他的那篇论文现在已是世界地舌科分类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调查云南水稻病害时,戴芳澜发现了中国水稻的一种病害,称稻一柱香病。在云南,他还积极主持他的学生和助手,多方面调查和研究云南的真菌和植物病害。在当时或在后来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充实和加强了中国的真菌和植病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他和他的学生以《中国真菌名录》中有关中国经济植物病害真菌的资料为基础,补充进细菌和病毒病原,编写成《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